



陶贵墓出土的扩志。

海瑞墓的谕祭碑。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古墓寻踪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晨

受“祖先崇拜”“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古人对墓葬十分重视。墓葬制度起源于史前时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演变，各时期的墓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海南的古墓，既承接了中原墓葬文化，也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最近，海南省博物馆披露了我省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的古墓葬群三亚“多坟山”墓葬群相关发掘成果，再次引发人们对海南古墓的关注。

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30厘米、宽约50厘米。因骨骼保存状况较差，只能初步判断墓主人身高约140厘米。整座墓未出土随葬品，却有8个柱洞环绕四周，考古人员推测柱洞与墓葬为共生关系，其上部以前可能有棚架设施。

桥山遗址古墓是海南最早发现的史前古墓，但它并不是年代最早的。2017年，联合考古队又在三亚英墩遗址发现了一座古墓，墓主人骨骼保存基本完好。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的器物进行初步分析，专家推测英墩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6000~5500年。这是海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墓，其出土的人类遗骸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两座史前古墓的发现，证实了上古时期海南先民已摆脱“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的蒙昧情境，海岛文明之光渐亮。



陵水湾福湾珊瑚石樟墓。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被列为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海南古墓

海瑞墓	明
藤桥墓群	唐—宋
丘濬墓	明
陈道叙周氏墓	南宋
灵照墓	南宋
唐胄墓	明
周仁浚墓	宋
张岳崧墓	清
薛远墓	明
吴贤秀墓	唐
吴氏古墓群	清
韦执谊墓	唐
韦四公、韦九公墓	明
王居正墓	南宋
曾鹏墓	明
蔡氏古墓群	宋—清
黄麓墓	宋
李氏古墓群	宋—元
梁云龙墓	明
光村墓群	唐
玄达先师塔	清
荆王太子墓	元
许模墓	宋
韩显卿墓	南宋
苏升墓	南宋
符确墓	宋
庵堂山墓塔	清
南轩古墓	元
李庆隆墓	清
王弘海墓	明
军屯坡珊瑚石樟古墓群	唐
林杰墓	明
吴元猷墓	清
潘存墓	清

文字/罗安明
制图/杨干懿

墓葬最特别的古墓 瓮棺墓、珊瑚石棺墓

先秦及两汉时期海南岛的墓葬形制受到我国内地墓葬文化的影响，但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岭南地区的墓葬差异较大。

汉代海南岛最具代表性的墓葬为瓮棺墓。据文物部门统计，目前海南已发现汉代墓葬5处，分别是陵水的福湾墓群、军屯坡墓群、孟坡墓群，白沙的志针墓群，三亚市藤桥地区的番岭坡墓群。这5处都是瓮棺墓群，葬具组合有瓮罐相扣、罐罐釜相套等形式。

瓮棺墓最早出现在我国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等史前遗址中，其中的陶瓮及瓮盖是当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无需专门烧制。瓮棺内埋葬的多为夭折的儿童。海南发现的瓮棺墓年代均为汉代，但同时期在内地几乎没有这种墓葬。由此可推断，虽然汉代中央政权已加强对海南的管辖，但当时内地的墓葬文化并未快速传入海南。

石棺在我国古代比较常见，但海南有一种材质很特别的石棺——珊瑚石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陵水和儋州发现珊瑚石棺墓群，即陵水的军屯坡墓群和儋州的光村墓群、泊潮墓群、新隆墓群。其中，陵水军屯坡有100余座古墓，儋州3处墓群的古墓总量达四五十座。珊瑚礁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地区，古时一些居住在海边的居民采掘珊瑚石作为建筑材料，建造石屋、石墙、石棺等。现如今，出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需要，我省已出台《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等法规，严禁采挖珊瑚礁、销售或购买珊瑚礁及其制品。



海瑞墓。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陵水一座古墓出土的珊瑚石雕人像。

三亚多坟山古墓群出土的带盖陶罐。



海口林村宋墓出土的买地券。

出土重要文物的古墓 金牛岭陶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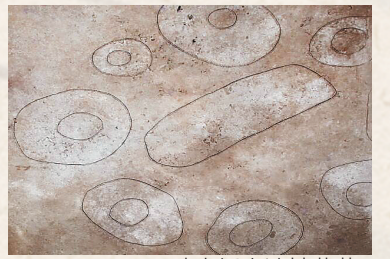
我国古人去世后，其亲人一般会根据他(她)生前的喜好或想法，置办随葬物品放入墓中。经考古人员发掘，这些随葬品便成为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的文物。

1984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林村一带的两座宋代古墓，分别是周一娘墓和薛氏墓。这两座墓的形制、结构、大小基本相同，内置木棺，出土的随葬品有陶魂坛、陶仓、陶享、买地券等。

这两座宋代墓出土的买地券均由泥质灰陶制成，呈抹角长方形，上面刻着墓主人的籍贯、生卒年月、墓葬地。生者为去世的亲人添置买地券，意在方便死者在阴间买地，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上较好的生活，这体现了封建迷信思想。陶魂坛是另一种与封建迷信相关的随葬品，大多发现于我国南方地区六朝初期的墓葬中。买地券和陶魂坛相伴出现，折射出宋代海南承接内地墓葬文化仍存在滞后的情况。

说到出土重要文物的海南古墓，就不得不提位于海口金牛岭公园的陶贵墓。1999年5月，在海口市金牛岭职工宿舍楼基建施工过程中，工人发现了墓葬群。考古人员闻讯赶到现场，对墓葬群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共发现古墓11座，其中明代墓2座、清代墓9座。其中的明代海南卫镇抚陶贵之墓，为砖石结构。随葬品有陶质的俑、镇墓兽、罐、盒、鸡、马、狗等，以及金属类的戒指、耳环、发簪等。尤其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墓室中有陶质扩志(即墓志)一盒两块，上面刻有大字“故武略将军海南卫镇抚陶公扩志”，以及400多字的扩志文，这些文字记录了陶贵的生平。这种陶质的墓志铭，十分罕见。

陶贵墓的发掘，丰富了海南明清时期丧葬制度的研究实例，尤其是陶质扩志的出土，为探讨海南明代卫所的设置提供了实证。



陵水桥山遗址墓葬。

规格最高的古墓 巨儒名臣的谕祭葬

谕祭葬也称敕葬，是皇帝对一些已故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优待恩遇，表明皇帝对他们一生功绩的肯定和褒扬，有时朝廷还会派官员督建墓地，墓的规格、气势自然不一般。《琼山县志》记载：“由唐迄宋，人文蔚起，至明尤盛。”明清两朝，海南人文鼎盛，涌现一大批进士和举人，琼籍英才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者比比皆是，其中不乏达官显贵。一些从海南走出去的巨儒名臣死后获得了谕祭葬的待遇，其墓地不仅有墓冢、墓碑，一般还建有神道、石像生、石华表、石牌坊等。立于墓前的谕祭碑，更是直接体现了墓主人身后享受的荣耀。

海南最早享受谕祭葬待遇的是宋代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去世的曾任兵部侍郎、文华阁大学士兼枢密使的王居正。王居正并非生于海南，但他携妻儿渡海来琼定居，并在海南去世。他的墓地位于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地区。明清时期，海南籍官员获得谕祭葬待遇者相对较多，比如明代曾任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丘濬、曾任户部左侍郎的唐胄、曾任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等，清代曾任湖北布政使的张岳崧。

海南现存明代官宦古墓中，丘濬墓和海瑞墓是受关注较多的两座，这两座墓相距不远，都在海口丘海大道一带。丘濬和海瑞被誉为“海南双璧”，两人生存年代相近。他们的墓规格很高，形制方面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座墓都有神道和石像生，墓碑上都刻有“皇明敕葬”4个字，墓地入口处都有石牌坊。海瑞墓前的石牌坊刻有“粤东正气”4个大字，丘濬墓前的石牌坊刻有“理学名臣”4个大字。这些设施和细节，既彰显了他们名臣的身份，又概括了他们的风范和才学。

海南明代古墓以石冢墓为主流。至清代，海南有特色的古墓还有塔式墓，包括澄迈庵堂山墓塔、琼海玄达先师塔等。从墓的造型、风格及“比丘”“先师”等碑文来看，这类古墓的出现与佛教在海南的传播有直接关系，是海南多元文化并存的实证。

《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墓葬文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从史前时期的土坑掩埋，到唐宋时期的砖石墓穴，再到明清时期规格很高的敕葬……零星分布于海南各地的古墓，像一个个地下迷宫，给人以神秘感，又像一部部内涵丰富的史书，真实地记录着海南的历史风貌和人文脉络。

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古墓 三亚英墩遗址墓葬

据近年来文物部门的调查统计，海南已发现的古代墓葬年代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至清代，但并非各历史时期都有。从分布情况看，海南岛北部、南部古墓数量较多，中部地区数量较少。因琼州海峡的地理阻隔，加之考古发掘的缺失，海南古代墓葬文化缺乏系统延续性和继承性，并表现出与移民文化较为一致的特征。海南已发现的史前时期古墓仅两座。

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陵水桥山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在发掘到第三层文化层表面时，发现土壤颜色有些许变化——相对纯净的沙土中间，出现了一片土质较松、土色较杂的区域，这是较为典型的“葬土”。在正式发掘中，他们清理出了人的颅骨、胫骨等。由此，海南发现的首座史前古墓揭开了面纱。

桥山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3500~3000年，这座古墓